

清代浙江沿海诸道海防活动考论

祝太文

(公安海警学院基础部, 浙江宁波 315801)

【摘要】浙江沿海诸道是清廷在浙海防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乾嘉年间浙江沿海诸道参与打击海盗; 鸦片战争期间, 浙江沿海诸道督办军需、监管海防设置建设、招募水勇, 组织辖区力量配合军队防堵港口, 参与对英交涉等; 中法战争期间, 浙江沿海诸道参与筹防, 宁绍台道更是直接参与军事部署的规划、将领间的协调沟通, 为镇海口战役的最后取胜奠定了基础; 甲午战争期间, 浙江沿海诸道也积极筹防。清代浙江沿海诸道, 在清代的海防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清代; 浙江; 沿海诸道; 海防

【中图分类号】K892.4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18)01-0063-08

清代有辖区的地方行政职官多为守土之官, 有的握有节制辖境驻军的权力。地方诸道即具有督察本辖区驻军的权力, 带有兵备衔的还拥有节制本辖区都司以下各武职的军权。介于省与府之间的道设置源于明代, 并非一级地方政权组织, 而是省级政府派出的监察或办事机构, 其职官道员为藩臬二司的佐贰, 皆因地因事而设, 职衔各异、品秩不一, 没有形成制度化。清代沿用后加以精简完善, 至乾隆十八年(1753)停道员布、按二司兼衔, 品秩统一为正四品, 道员就不再是藩臬佐贰, 但其辖区仍属监察区性质, 地方道员职掌为“整饬吏治、弹压地方”^[1]。学界对道和道员的研究多集中于道的性质、设置、分类, 道员的编制、任用、职权等, 对道员的军事职能所述较少, 对沿海地区道设置的海防意义述之更少。^①学界对海防的研究也多着眼于海防军队的活动, 而对于沿海文官参与海防活动较少注意, 至于清代沿海诸道的海防活动更是缺乏关注。海防通常是指为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 防备外来侵略, 在沿海和领海内所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2]沿海诸道是沿海地区社会发展和安全稳定的重要地方行政职官, 又肩负有相当的军事职责, 于清代沿海地区治理和海防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中国沿海绵长而辽阔, 本文以浙江沿海诸道为个案, 通过对清代浙江沿海诸道在几次规模较大海防活动中表现的梳理, 尝试说明清代浙江沿海诸道是海防活动

收稿日期: 2017-05-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BZS122)

作者简介: 祝太文(1971-), 男, 江西玉山人, 公安海警学院基础部副教授, 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海疆史地研究。

网络出版时间: 2017-09-14 10:55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273.Z.20170914.1112.012.html>

①朱东安. 关于清代的道和道员[J]. 近代史研究, 1982(4): 178-210; 吴吉远. 试论明清时期的守巡道制度[J]. 社会科学辑刊, 1996(1): 96-101; 周勇进. 清代地方道制研究[D]. 南开大学 2010 博士学位论文; 傅林祥. 清康熙六年守巡道性质探析[J]. 社会科学, 2010(8): 144-152; 周勇进. 清代道员职衔考述[J]. 清史研究, 2012(2): 36-42; 尹宗云. 清代皖南道研究[D]. 复旦大学 2011 硕士学位论文; 程潞明. 清季四川兵备道研究[D]. 西南大学 2015 硕士学位论文; 祝太文. 清代浙江诸道设置述略[J]. 嘉兴学院学报, 2016(3): 50-56; 苗月宁. 晚清登莱青道选任问题初探[J]. 历史教学, 2016(9): 25-31; 等等; 所述参与海防活动的事例少。

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海防安全的重要维护者。在厘清相关历史事实的同时，也希望给今后相关的研究提供一个铺垫，给当代海防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与参考。

一、乾嘉年间参与剿灭海盗

浙江定海、普陀、衢港等处渔场夏季盛产黄鱼、冬季盛产带鱼，每年四五月和十一二月渔季都聚集有众多的渔船，渔民构成复杂，兵船巡查稍有疏虞，贼盗往往乘间劫掠。^{[3] 卷 1:16} 每至渔季，巡道督饬沿海府县及佐贰巡查渔港，维持鱼市秩序，防范斗殴、枪夺，处置渔季后滞延回籍的渔户等。乾隆晚期，海防逐渐废弛，福建海盗浙人浙江洋面，嘉庆元年(1796)福建海盗李发枝勾引安南海盗(史称艇匪)内侵，窜扰浙江洋面，浙江凤尾等盗帮蓬起依附。“浙洋自南距北二千余里，我南则彼北、我北则彼南；我当艇则闽肆其劫，我当闽则艇为之障，且艇强，即遇亦未能必胜；闽狡，即未遇已望而先走”，浙江官兵剿捕毫无成效。^[4] 阮元抚浙后改变策略，以海上追剿与陆上拒守相结合，陆上拒守主要由地方职官协助完成，由道员督饬府县各官稽查户口、编制保甲，互相纠察以清除沟通；又募集、训练义勇，各地因地制宜修治防御工事，制定沿海各村落守望相助的办法。

嘉庆五年(1800)六月，安南海盗遭遇飓风摧毁后，沿岸乡勇迅速投入搜捕登岸残匪行动，安南海盗首领善艘队长大统兵伦贵利即为乡勇所擒。^{[3] 卷 2:6} 安南海盗自此不复再入浙江洋面，但随后却又兴起了福建海盗蔡牵等帮匪肆劫浙江洋面事件。为了及时掌握蔡牵、朱溃海盗船的行程，阮元行札按察司、宁温二道以及沿海厅县，要求督饬沿海文报传递之各县驿，“嗣后除寻常土盗入境照旧办理外，一有蔡朱二逆窜到该境消息，该地方官即用军务传单填明何盗入境事由，星飞传报，以便一路皆知。如该逆人北关等处洋面者，平阳县即飞报本都院及宁台道、定黄温三镇中军衙门”，如有迟延以贻误军情论。^[5] 水师作战利在战船与枪炮，战船除委托福建船厂造新式大船外，在杭州、宁波、温州设厂铸造大炮。为了满足水师追剿海盗的需要，巡抚阮元甚至对提督邱良功说“其应行雇募大船、配足炮械等事，均乞与宁波道府札商办理，随时示以数行可也”，不几日还亲自饬令宁绍台道雇募十二只大同安船以供提督邱良功使用。^{[3] 卷 3:16-17} 温处道陈昌齐还“募人出海绘图，闽浙海洋全图，纤悉备具”，为海上追剿海盗提供了方便。^{[6] 11400} 嘉庆十四年(1809)八月十八日，蔡牵在渔山洋面被提督邱良功等追剿围攻，穷蹙间破船沉海。^{[3] 卷 3:9} 蔡牵死后，大规模的海盗帮匪自此退出了浙江洋面。

二、鸦片战争中参与筹防和对外交涉

(一) 配合军队防堵港口

道光十九年(1839),广东发起禁烟运动。为断绝英国鸦片商人在广东各口岸的贸易，十二月初二日，清廷谕令林则徐等“凡英吉利夷船，一概驱逐出境，不准逗留”。二十六日，又责成林则徐等委派文武各员，在广东东西两路各隘口严缉影射、查拿奸徒，并谕令浙江等沿海各省督抚，督饬所属认真稽查各海口，一体防范绝其去路，如有窜人即尽行驱逐以杜绝鸦片来源之积弊。^{[7] 册 37:1168, 1186} 浙江巡抚接谕后马上调动沿海文武官员做好防范，海上方面当即飞咨提镇，饬令各水师整船配备兵，由该管镇将统带出洋梭巡，发现夷船即加拦截并驱逐，不准近口停留；沿岸港口方面则“札司移行各沿海道府，督饬所属会同守口各员弁，一遇夷船在洋，刻日封港，不准内外小船出人。如有奸民偷拔出口，或与夷船交易，或将薪米接济，立时严拿惩办”。并派数员通判、同知分赴温州、台州、宁波、乍浦各要口巡察，遇有夷船来浙即迅速报告。^{[8] 388} 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初五日，象山县爵溪洋面、定海县韭山洋面有夷艇游弋，提臣阮元即带领将弁出洋堵御，而“宁绍台道李绍昉亦即力疾会同水师，驰赴镇海海口防堵，”并督饬鄞县知县舒恭受会同营汛委员封港稽查；巡抚乌尔恭额得报后除亲往宁波会同提镇筹议驱逐，又“札司移行沿海各道府，督县小心巡防”，并飞咨温台二镇、乍浦副都统及沿海各省督抚，一体防属预防。^{[8] 90-91}

(二) 督办军需和海防设施

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初八日，英军攻陷定海县城，巡抚乌尔恭额急忙筹办沿海防御，并做所谓的征剿定海准备。在杭州省城、宁波府城各设一处军需局，在镇海县城设立一处粮台，饬委道、府、同、通、知县或佐杂等官专门负责收支粮饷、军

火以及置办器械对象等事宜。^{[8]103}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各府口岸众多，由各该管道府督饬厅、州、县估价购料修葺防御工事，镇海之粮饷军火先贮宁波府城，也由宁绍台道兼管。杭嘉湖道还陪同杭州将军遍历乍浦冲要海塘崖岸，亲自会同水师堆高培厚拓宽乍浦西山炮台。^{[9]170}十二月初，刚抵巡抚任的刘韵珂与在省司道筹议防务，认为“以该夷船坚炮利，若在洋面接仗，是以我所短就彼所长。总以勘择要口，修筑炮台，制造巨炮，严密防守为第一要策”。于是马上饬令沿海道府会同营官亲历所属海口，迅速查明并禀报“何处应行设防，有无旧存炮位尚堪应用，应否添铸巨炮，并添铸之炮究须若干斤重”等；同时饬令省局司道委员迅速赴江苏购买铁斤，并将省城铸炮工匠吴通海等调往镇海赶铸。^{[8]235}十二月底，钦差大臣伊里布在镇海各要口增添防御工事，又饬令宁绍台道尚开模全程督办。^{[8]255}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刘韵珂督率杭嘉湖道宋国经亲勘后，饬令该管各府督同州县确估购料，兴修从海宁州尖山直至平湖独山寨海口的炮台、炮房、营房，复饬杭嘉湖道宋国经总督监办，并转饬杭州府赶铸大小炮位以便分拨应用。^{[9]174}

（三）雇募乡勇水勇

道府督同州县团练乡民协防，“内派在陆地防守者谓之乡勇，可令出洋攻击者谓之水勇”。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间，英军占领定海后，派船在内陆各口岸外来回窥探，巡抚乌尔恭额等赶紧调兵遣将，聚集镇海等处要隘加意防堵，而沿海其他口岸也分别增派了防兵，但兵额有限。巡抚乌尔恭额等认为，兵少“不足以壮声威而资守御”，于是饬令府、厅、县雇募团集乡勇，分别塘岸昼夜巡防。又因“水师不敷遣用”，于是宁波府督同各属绅士，雇募熟悉海洋之人数百名以备攻剿。^{[8]199}在乍浦方面，巡抚乌尔恭额认为原有乍浦额设水师守备90名、防汛陆兵136名不足以防守，也饬令招募乡勇协守，道府督同厅县很快雇募了1500名乡勇，并由兵弁训练后派往共同堵御海口。^{[9]171}

（四）参与对英交涉

清代前期，中央有礼部、理藩院等机构处理外交事务，地方并无专门的外交机构，有的道员兼有监督各地对外贸易口岸或海关的职能，海关所兼涉的外交事务也就由其处理。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十二日英军再陷定海，接着攻陷镇海、宁波，此后数月间劫掠了奉化、慈溪、余姚等地。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奕经三路反攻全部失败。二月初十日，浙江巡抚刘韵珂密奏“十大可危虑”，分析再战形势极不乐观；十三日，奕经奏请对英军“暂示羁縻”。^{[9]97, 105}道光帝的信心开始摇摆于进剿与羁縻之间。四月初九日，英军攻陷乍浦。二十七日，道光帝责成奕经妥办该处防剿，同时谕令耆英妥为商办羁縻。^{[7]册38:687}五月初，耆英会同伊里布等商议羁縻的办法后，即带同宁绍台道鹿泽长、石浦同知舒恭受等赴江浙交界平望一带，寻机羁縻仍活动在江苏洋面的英船。^{[9]249}七月英船进犯至江宁，宁绍台道鹿泽长等赴江宁参与款议。^{[6]4529}《南京条约》签订后，宁绍台道鹿泽长回宁波处理善后事务。九月初，英军准备撤离镇海之招宝山，宁绍台道鹿泽长、石浦同知舒恭受等受耆英之命前往“收复”镇海，负责与英军沟通、协助英军搬运器械什物上船，看护英军舰船驶向定海洋面。^{[9]388}随后，驻定海英军与中国方面往来照会、回文，相互交涉事宜多由宁绍台道办理。十月，刑部处理地方失守各官，宁绍台道鹿泽长以失守宁波罪革职。十一月巡抚刘韵珂以“夷船尚聚定海，其众时时出人郡城，而定海镇标兵丁因未能归伍，仍在该处驻扎，华夷错处，兵民杂居，控制防闲尤非易易”；而且“通省人心，亦以伊等能弭衅安民，视为长城之倚”等因，奏请饬善于外交事务的鹿泽长回任。^{[9]408-409}道光帝没有答应，但同意鹿泽长协助新任宁绍台道办理夷务。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宁波筹办通商事宜，由宁绍台道陈之骥负责，已革道员鹿泽长协办。^{[9]464}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宁绍台道麟桂带同鹿泽长等东渡接收英军交还的定海城；六月初三日，英军全部撤离舟山。^{[9]501}

三、中法战争期间参与浙东筹防

光绪九年（1883），法越兵事起，清廷叠次谕令沿海督抚加强海防，预为不测，当年五月，谕令沿海各督抚实力筹办、认真布置沿海防御。^{[7]册54:294}十月，又谕令浙江巡抚刘秉璋等就各省海口情形，详细筹划如何修筑炮台、储备军械、选调兵弁等以保无虞。^{[7]册54:402}十一月，再谕令刘秉璋迅速办理镇海等处防务，“严扼要口，并随时与闽苏两省互相策应，以期巩固。”^{[7]册54:425}刘秉璋以乍浦、镇海、定海等处为海防重点，在省库款绌情况下仍遵谕督饬司道尽力筹办，“将沿海炮台逐渐修整、添筑、

安设炮位，购办军火，添募勇营”，并“督饬沿海各属，实力办团、编查渔船保甲，以资绥靖”。^{[10] 卷2:34}

光绪十年(1884)正月，巡抚刘秉璋饬委候选道姚有志添募亲兵新中一营，并将乍浦原有一营楚军也交与姚有志统带，驻乍浦配合副将、象协水师等进行防守。温台二府形势相对较松，也“分饬该镇道府督率地方官力行保甲，妥为筹防以备不虞”。^{[10] 卷2:35-36}浙江沿海三道以宁绍台道辖境地理形势最险，筹防工作最为繁剧，巡抚刘秉璋委新任道员薛福成总理营务。光绪十年(1884)五月，法舰聚集福建洋面，沿海戒严。薛福成于闰五月二十一日接宁绍台道印后，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筹防工作。^{[11] 14}

闰五月二十七日，薛福成驰赴镇海实地勘察招宝山炮台和甬江口形势，与提督欧阳利见、镇海营房处杜冠英、宁波知府宗源瀚细致研究炮台修筑、河道钉桩沉船布雷又预留商船进出通道的办法，并令杜冠英负责刻期完成。六月，发布晓谕中外商船出人的认旗识灯告示。

六月初，为阻断法舰雇觅海口引水，薛福成通过宁波浙海关代办税务司纪默理，以重资与宁波仅有的两位洋人引水签约，保证不为法船所雇。同时，薛福成饬令“宁波府及渔团保甲委员，一体确查，晓以利害，申明赏罚，勿令该渔人等稍被煽惑，致误事机。”^{[11] 14}

七月初，薛福成利用英法在华利益的差异，又以中英条约有舟山不准让与别国，并申明英国有保护舟山且不用中国出款的条款，与英国驻宁波大使固威林进行交涉；亲加修饰，将幕友杨楷所作的《英宜遵约保护舟山说》交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翻译成洋文，分寄伦敦多家报馆发表，借舆论影响英国政府作出协防舟山的声明，从而牵制了法军而保护了舟山。

七月中，薛福成照会英国领事兼办法国事固威林，饬令宁波城内法国天主教堂男女老幼一并移往江北暂住，即安定民心也便于监视、防止刺探或内应；八月，定海法国天主教也采用同样的办法进行管理。薛福成还电请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守局外例，勿以煤米火药接济法船。并请英、丹公使饬大东、大北勿为法人递电，使彼呼应不灵。该公司曾立合同，尽可饬电报局与议，或稍诱之以利。事关大局，机不可缓。”^{[11] 14}

八月初，薛福成会同提督欧阳利见发布公告，嗣后中外各船夜晚不得进口，白天按具体规定程序入口，并将告示交税务司在外国报纸上刊发而广而告之；在游山驻泊轮船，派兵弁迎询、察看知会；选熟悉洋船旗号之人送招宝山、金鸡山两炮台，以便登高识别来船；杜绝法船混入口内；还对炮台进行伪装，使之与山色一体。

八月中，薛福成着手铺设宁镇电报线，饬令洋务委员李圭通过税务司葛显礼，函邀上海大北电线公司派人勘量“自镇海城外营务处杜丞冠英所驻之厘卡起，沿江至郡城和义门外江北岸新江桥边止，计陆线直路三十九里。又用水线过江，至宁郡原设电报局止，计长一千尺”。三个月后全线铺通，便捷了省城、宁波、镇海三地讯息的沟通，于海防统筹调度、前敌指挥收大裨益。^{[12] 卷1上:1-32, 卷4:10}八月底九月初，薛福成巡阅了定海、镇海口、梅墟等地的防御工事，查看了武器装备的准备情况。接着改造、加固、添筑各地的防御工事，补充定海兵力部署使疏防关隘有所备御。

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二十九日，南洋舰队五艘南下援台舰队，在象山县潭头洋被七艘法舰发现，南洋五舰迅速撤离避战，澄庆、驭远两舰就近奔入石浦港，越日，即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初一，两舰在法舰围堵下沉没。法舰继续搜索北返的开济、南瑞、南琛三舰。正月十四日法舰发现三舰躲入镇海口，次日开始炮轰镇海口，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开始。随后宁绍台道薛福成在想方设法保证后勤补给外，还展开了一系列有助于战守的事务。如会同提督欧阳利见出示严禁舰船兵弁登岸，以专意与陆上守军协同战守；^{[12] 卷3:28}发布劝居民各安生业告示，及时告知居民前线守军兵壮备足以及痛击敌舰的战绩，使宁镇居民仍安生业而未出现迁避乱象；^{[12] 卷3:29}提督欧阳利见也多与薛福成谋战守之策；^[13]薛福成筹防事务涉及方面综之有“因形势、设钜防、定民心、搜军实、用与国、伐敌谋、清间谍、杜向导、申纪律、明赏罚、励客将、布利器”等等。^{[12] 序:1}

薛福成还积极调和诸将关系，“始楚军、淮军分驻南北岸稍有违言，负意气不相下，且内斗”，薛福成“委曲调护”，使

各军基本协调共同对敌。^{[12]杨楷成:1} 镇海口战役持续至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下旬，法舰始终不能逞其志。四月二十七日，《中法新约》在天津签订；五月十七日，法舰全部撤离浙江洋面，镇海口保卫战取得了最后胜利。

四、参与光绪甲午浙江筹防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甲午战争爆发，清廷非常重视浙江、台湾等沿海的筹防，分别调派重臣前往料理，浙江沿海防务特谕令镇海之役主要将领吴杰和前浙江巡抚刘秉璋迅速前往浙江待命，并让巡抚廖寿丰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商量匀拨南洋舰队的兵轮前往浙洋协防。^{[7]册 56:393} 廖寿丰随即飭令沿海道府督同州县举办团练保甲，配给军火，以为防军之助；沿海渔民也编组渔团，“以遏内地奸民潜通外寇之萌”。海防军队部署上划浙东为三路：温州沿海为南路、台州沿海为中路、宁波沿海为北路，以路归并各防营的部署分布，以水师兵轮策应三路防营的防务，又以小轮船四艘在洋来往巡哨。^{[14]卷 121:17}

此次浙江沿海筹防主要在宁波府镇海和嘉兴府澈、乍等地展开，又仍以镇海为重点，由道府督同州县筑土堤、修炮台。而沿海其他区域防务则疏于筹备，如在温州沿海，日本起衅后调任温处道的宗源瀚，本巡抚廖寿丰被倚为守围股肱，然而宗源瀚“积劳发白，稍稍衰矣”，且身体日渐憔悴多病，仅是想方设法“慎固应变”，以“持廉养正不可以私干教养”而“就理如故”，没有开展筹防活动。^{[15]镇海等处筹防承办公地方行政官和兵弁实际也不以筹防为重，甚至贪污腐化。因而有人向朝廷奏告：“镇海口防营徒糜帑项，提督张其光昏耄废弛，副将费金绶、知府冯相荣惟以吸食鸦片烟为事，参将邓骢保日事赌博、在营纳妾并干预地方讼事，总办支应局县丞吴元鼎挟妓饮酒毫无顾忌，堵塞海口需用船只、木桩勒索浮冒等。”^{[7]册 56:825} 清廷谕令巡抚廖寿丰查察，廖寿丰查后报告称“提督张其光查无废弛之处，总兵费金绶、知府冯相荣并无嗜好”，仅有玉环参将邓骢保纳妾、县丞吴元鼎年轻尚气不知远嫌而已，于是朝廷将邓骢保撤去轮船管带以守备降补，吴元鼎即行革职勒令回籍了事。^{[7]册 56:867}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二十三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甲午战争结束，浙江沿海筹防便也告一段落。}

五、管理塘工、备御沿海

（一）管理塘工

海塘是人工修筑阻挡海潮冲刷漫灌的堤坝，是浙江杭嘉湖苏松常镇诸府防御海潮的重要屏障。浙江滨海六府均有海塘，浙西海塘自仁和县乌龙庙起，往东经海宁城南东达尖山约为一线连绵的长塘，又渐绕而北过海盐之澈浦、平湖之乍浦，达于金山界为断续的海塘，海塘绵长近三百里，是为北塘。^{[16]卷 17:5-18} 浙东海塘有自萧山之西兴关起至会稽曹娥江文昌阁止，有江海塘二百多里，是为南塘；^{[16]卷 17:20} 南塘有时所指还包括上虞、余姚、慈溪，直至镇海口三百余里断续的海塘。浙东海塘还有镇海口迤南直至福建福鼎县界的断续海塘，沿途多山海塘坝多建在海湾澳口，如：镇海县有泥湾、穿山、霸衢诸塘，鄞县大嵩港至金鸡桥有沿海塘，象山县东北有陈桃塘、县南有岳头塘，宁海县健跳城外有健阳塘，临海县东北有咸塘，黄岩县有丁进塘、洪辅塘、四府塘、捍海塘，太平县有净社塘、长沙塘萧万户塘，乐清县有蒲岐、青屿、小江、蒲岙、永宁诸塘，瑞安有沙园塘，平阳县有护安外塘等等。^{[16]卷 1:15-19} 由于镇海口迤南之山土性多属坚结，海塘不易被海潮冲决，海塘建成后维护费用较省；而镇海口以北因沿海平衍，又“江水顺流、海潮逆上”，在“南岸自绍郡之纂凤亭，北岸自海宁大小尖山，激起潮头银涛雪浪横拽直卷，加以回溜汕刷”，工程难度大、用料费贵，其中北塘又是杭嘉湖苏松常镇数府安全的屏障，故清代浙江海塘修筑多关南北塘，而南北塘中又以北塘建设为重。^{[16]卷 1:6}

清代浙江海塘建设始自康熙初年，此后历年屡有兴修。海塘日常管理原先归该塘所在各州县负责，遇有大的兴修则由朝廷遴委大员承办。^{[16]卷 13:4} 雍正十一年（1733），浙江设立海防兵备副使道专门负责塘工，统辖海塘文武各官及海塘所在的各州县官。乾隆十九年（1754），“裁汰浙江海防道，北岸仁和、海宁、海盐、平湖四县塘工归杭嘉湖道管辖，南岸萧山、山阴、会稽三县塘工归宁绍台道管辖。”^[17] 光绪三十四年（1908），设海塘巡警局和工程总局，北塘“寻常次要之工分报杭嘉湖道，暨工程总局转详核办。若遇险要急工，无分雨夜首先驰报工程总局，立刻合力抢修，一面飞报杭嘉湖道详请履勘”。^{[14]卷 52:34}

（二）备御沿海

清代浙江修筑海塘捍御海潮，亦可视作类似城防的设置，在冷兵器时代用作对付使用弓箭刀矛的进攻者，其功效是明显的。捍海塘堤各应地形潮势形成有土塘、柴塘、石塘、土石混筑塘等。康熙五十四年（1715），浙江巡抚朱轼在海宁试筑鱼鳞石塘，经历飓风大潮后，所筑石塘仍异常牢固，此后南北两塘逐渐改筑鱼鳞塘。并逐渐形成通用建造程序，塘身用长、宽、厚分别为四尺五寸、一尺二寸、一尺的四面光平条石纵横交错砌筑，通常筑为十八层，有些地段面上再加不收口的二层，底宽一丈二尺，逐层收口至顶面宽四尺五寸，塘高一丈八尺或二丈；塘内再堆筑附土（即土钱），面宽二丈、底宽三丈，高出塘面二尺。^[18]高耸的海塘成为防御海上进攻者的一道障碍。在海塘内侧修有隔离潮卤的塘河，可防逾越又可以走船运输，在海宁某些地段塘河内侧又修有土备等塘，交错修筑的海塘、开挖的塘河具有海防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清廷虽然对海塘用于海防始终讳莫如深，但诸如《敕修两浙海塘通志》凡例说：“兹志凡两浙有塘州县，小则修葺，大则建筑，无不备载，至防海机宜，事关戎政，概不拦人。”^[16]凡例:1 透露出海塘也用于海防的目的，仅是事关“戎机”而保密罢了。从海塘管理上，清廷将其用于海防目的明确，雍正八年（1730），浙江总督李卫奏请照河营兵丁之例设海塘兵时说，塘兵“分于东西两塘常川做工、看守……冬月如有闲时，亦可操练、防护海滨私运米盐等类”。^[19]雍正十一年（1733），李卫等请设海塘营弁时又说，海塘官兵可“于工筑之暇仍令勤加操演，则海疆亦可藉兹防御”。^[20]卷 30:30 清廷先后均予以采纳，说明清廷对李卫的主张是支持的。塘兵分汛驻扎巡守，北塘省城庆春门外接塘头至金山界分十二汛，仁和、海宁段设堡房四十处，海盐、平湖段设堡房二十处；南塘设堡房四十处。^[16]卷 17:11-18 塘兵配备有“军械、袍褂、铅斤、火药等项”，军械除弓箭、刀矛、鸟枪外，还有大炮，与其他清军一样操演。^[21]对此，嘉兴知府许瑶光说：“时廷旨命修海塘，而海盐、平湖向系鱼鳞石塘，沿塘皆筑堡寨驻兵，疑当初非止防潮，实藉以防海寇也。”^[22]巡抚富呢杨阿说，海盐、平湖“二邑东南之境滨临大洋，易启奸匪，所以修筑之功较少，而巡防之事居多。乍防既有修造战船之责，而沿海堡房鳞次栉比，击柝相闻，俾宵小闻风知警，则营员之随时防守，关系亦匪轻哉”。^[23]

自鸦片战争后，西式武器逐渐大量用于针对中国的战争，海塘的军事作用同城墙一样逐渐退居次要地位。道光二十一年（1841），有英舰驶进尖山口，海塘东防同知王德宽与扬威将军奕经所委缪长发等，“督率河北义勇八百名，伏东塘土堰之后，与兵勇互为倚援，待其至而袭击之”，旋因英舰退走而作罢；后英舰复来，“而海口及沿塘兵勇声势甚壮，防守綦严，（英舰）梭巡不敢进”。^[24]但乍浦一线海塘堡寨、炮台，镇海后海塘安设的炮位，都没能挡住英军大炮的轰击。定海城南钦差大臣裕谦请修的海塘（当地称土城），东自青垒头、西迄竹山长一千四百三十多丈，高丈余，沿塘安设有许多土牛炮位，也没有挡住英军的第二次进攻。^[25]但在敌我武器装备相近等情况下，海塘还是有利于防御的，清廷也希望借助海塘加强相关海防防御能力。鸦片战争后历次筹办海防，沿塘的海防设置还是不断得到巩固。如乍浦海塘、炮台就屡屡得到修复、加固、扩建等。定海南海塘则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七月英军撤走后，马上予以修复，并于海塘之上再安设 71 门大炮。^[25]余姚庙山镇之北有利济塘，向东直到慈溪，沿利济塘也安设有许多炮台，民国时仍留有遗存。在利济塘之北，西自沥海东达龙山，复有新迂塘，原也用以防海，叫新御塘，后转音为新迂塘。^①

六、结语

清代浙江诸道，在清初有额设道标官兵，常与总兵相提并论，被分别称为道将、镇将，在地方征剿和防御中道镇相互配合，道员除参战外还负责情报、后勤供应等。在道标被裁撤后，道员仍拥有监督辖区驻军的权力。雍正之后，浙江地方诸道演化成四个分巡道，并先后拥有兵备衔，均具有巡察地方吏治、监督本辖区驻军之权，辖区内都司、守备以下诸武职并听其节制，成为了本辖区的民政和军政最高长官。战时地方诸道多负责沿海筹防，承担社会治安、组织民团、筹集运输粮饷、制造军械等后勤事务，甚至受命直接指挥战斗、负责战役规划及调和诸将协同战守等。宁绍台道、杭嘉湖道还兼辖塘工，分别负责南海塘的建设与维护。清代修筑海塘带有海防的目的，清廷在海塘之上置有塘兵、设有堡寨、安有炮位。所以，清代浙江沿海诸道在海疆治理、沿海社会安全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 50}

清代浙江沿海诸道在对外海防上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乾嘉时期、鸦片战争时期、中法战争时期、甲午战争时期参与各种海防活动，以及对带有较隐性海防意义的海塘工程的监管。乾嘉年间打击海盗，虽然多有剿除闽粤海盗目的，但抗击安南艇匪则具有了反侵略意义。鸦片战争期间，浙江沿海诸道督办军需、监管海防设置建设、招募水勇，组织辖区力量防堵港口，参与对英交涉等。中法战争期间，浙江沿海诸道参与筹防，宁绍台道更是直接参与海防的具体筹划、军事部署的规划、将领间的沟通协调，为镇海口战役最后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军事基础。甲午战争期间，浙江沿海诸道具体到地方分为三路筹防，钱塘江口、海门江口、甌江口，主要由诸道督同府州县官筹备海防，虽有怠工但或多或少还是加强了浙江的海防。综之可知清代浙江沿海诸道，在清代的海防活动中具有相当的地位和作用。

参考文献:

- [1] 祝太文. 清代浙江诸道设置述略 [J]. 嘉兴学院学报, 2016 (3): 50-55.
- [2] 辞海编委会. 辞海: 中册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2154.
- [3] 阮亨. 瀛舟笔谈 [M]. 扬州阮氏刻本. 1820 (嘉庆二十五年).
- [4] 李桓.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卷三十九补录 [M]. 刻本. 1890 (光绪十六年): 1.
- [5] 张鉴. 雷塘庵主弟子记: 卷三 [M]. 仪征阮氏刻本. 光绪年间: 13.
- [6] 赵尔巽. 清史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7] 清实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8] 宁波市社科联. 浙江鸦片战争史料: 上 [M]. 宁波: 宁波出版社, 1997.
- [9] 宁波市社科联. 浙江鸦片战争史料: 下 [M]. 宁波: 宁波出版社, 1997.
- [10] 朱孔彰. 刘尚书 (秉璋) 奏议 [M]. 1908 (光绪戊申年) 刊本.
-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朝上谕档: 10 册 [M]. 桂林: 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6:14.
- [12] 薛福成. 浙东筹防录 [M]. 刊本. 1887 (光绪十三年).
- [13] 欧阳利见. 金鸡谈荟: 卷五至卷十三 [M]. 刻本. 1889 (光绪十五年).
- [14] 陈灏. 杭州府志 [M]. 铅印本. 1922 (民国十一年).
- [15] 缪荃孙. 续碑传集: 卷三十九 [M]. 刊本. 江楚编译局. 1910 (宣统二年): 21.
- [16] 方观承. 敕修两浙海塘通志 [M]. 刻本. 1751 (乾隆十六年).
- [17] 张廷玉.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 卷一百三十五 [M] //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624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8] 胡元洁. 海宁念汛大口门二限三限石塘图说 [M]. 刻本. 1881 (光绪七年): 42, 44.
- [19] 李卫. 敕修浙江通志: 卷六十五 [M]. 刻本. 1736 (乾隆元年): 26.
- [20] 许瑶光. 嘉兴府志 [M]. 刻本. 鸳湖书院. 1879 (光绪五年).
- [21] 方观承, 方傅穆校. 方恪敏公 (观承) 奏议: 卷二 [M]. 刻本. 1851 (咸丰元年): 29-30.
- [22] 许瑶光. 雪门诗草: 卷八 [M]. 刻本. 1874 (同治十三年): 7.
- [23] 富呢杨阿. 续海塘新志: 卷二 [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0: 710.
- [24] 朱锡恩. 海宁州志稿: 卷四十 [M]. 刊本. 1922 (民国十一年): 25.
- [25] 陈训正. 定海县志: 册二上 [M]. 铅印本. 1924 (民国十三年): 3.